

## 北方大学记

社会上知道以前有个北方大学的人不多了。北方大学创设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它的特点，我以为可以说，这所学校形式上更多地接近于所谓正规的综合大学。

晋冀鲁豫边区 1946—1947 年时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地理位置重要，工农业生产条件好。北方大学设在那里，有需要和可能把事情设想得稍微远一点。学校陆续开设包括文教、财经、工、农、医学等七个学院和经济、历史两个研究室，有的学院分本科预科，就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着想的。教职员队伍的水平也与学院设置相称。校长范文澜同志以外，先后有一批在教育、学术、文艺界富有经验的与知名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工作。他们中间，一部分是长期在边区从事教育工作的，如王振华、罗育、张柏园、增一、孟夫唐等。孟夫唐与王振华、晁哲甫抗战前在河北南部办教育，思想开明，得到不少青年信从。再一部分是从延安来的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如艾思奇、黄松龄、乐天宇、张宗麟，陈唯实、张光年、陈荒煤、叶丁易、王冶秋、尚钺、李何林等。其他还有一批新从北平等地去的专业知识分子。在校学生最多时上千

人。据说除西藏以外各省都有，也有来自台湾的青年。他们中不少人打听到了北方大学，慕名远道而来，历尽艰险。学校里重视学术讨论、思想交流。1946年夏天举办暑期讲演会，范文澜讲历史，聂真讲农村政策，还有讲哲学、讲生物学的。1978年我编辑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的《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最初就是他在暑期讲演会上讲的。如有的回忆者所提到的，学校领导层有过办学方针的讨论和争论：“短训班，还是正规化？”要是事实上不存在某种所谓正规化的形式，就不会发生那种争论了。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以后，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再过半年多以后又进入北京，成了人民大学前身的一部分。它存在的两年半时间里，为革命输送的干部约一千四五百人。这些干部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发愤努力，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造诣不凡、成绩卓著者并非仅见。他们胸前也许没有排列那么多奖章、金银铜牌，他们却以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那种形式的奖章、金银铜牌。不论从办学特点和培养人材来看，北方大学在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史上是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值得记上一笔。

我是1946年2月初从冀南转到北方大学去的，那以前在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威县参加筹备一所拟名为建国学院的干部学校。这时上面来通知，建国学院停办，调我和主要负责人张箕南至北方大学工作，并且马上去边

区政府报到。我们搭乘一辆卡车，经邯郸去武安边区政府所在地。路过黄粱梦，大家看了看那座八年战火里残存的小小庙宇。三年以前即1943年7月，我由冀南往山西，夜过日军封锁线，就是从黄粱梦车站南面不远的地方穿过的。铁路两侧各有两人多深的壕沟，一人多高的栏墙。日军铁甲车开着探照灯来回巡逻。我们一行武装的和徒手的20余人，从巡逻车空隙里越过了沟墙，向西急行。如今是光天化日，车站一派宁静，不过铁路只剩下路基躺在那里。我们到边区政府是要等待同杨秀峰主席和其他同志见面和谈话，办理简单手续。三四天以后即办完一切，赶赴邢台进了北方大学筹备处。全国这时表面呈现和平景象，邢台在河北南部素称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此时市面也有所恢复。从南方往北平复学的大学生和北方南下回籍的知识分子，成批或个别从这里路过。北方大学一时成了他们参观与临时落脚的地点。延安、北平、邯郸间每周有飞机来往，与学校有关的消息能够及时传到。范文澜同志到校以后，教职人员正式分工。张箕南担任秘书主任，不久又回了冀南威县。我先后任教务处副处长、工学院负责人、历史研究室副主任，也是学校领导小组的成员。八年以前投笔从戎，现在又回头来投戎从笔，其实是从零开始。

在北方大学工作的两年多里，我经历了两上太行，两下平原。在那以前的1939年1月我随抗大由陕北到达晋东南，初上太行；同年12月分配到冀南行署工作，初下平原。1943至1945年又一番上下。到北方大学后的头回

上太行下平原，是抵邢台不久的事。王振华、罗青两位认为，北方大学如何办我们缺少经验，最好有人去设在长治的军政大学参观“取经”，希望我能够走一趟。其时多年不见的红火的灯节已过，我带一名通讯员一匹马出发，田野略透露一点春天气息。刚走到冶陶，突逢大雪。下一站至东阳关，借宿寒假中的小学教室里，房檐上挂满又粗又长的冰柱。冰坚路滑，人困马乏。但我们仍在第五日天黑时赶到长治专署，并于翌日上午抵达军政大学校部所在地高家庄。这时才知道校长是徐深吉同志。徐抗战期间是冀南新四旅旅长。“百团大战”中，他的部队在石家庄德州一线作战。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代表政府、群众团体前去劳军，地点好像在故城、枣强间。旅指挥所距敌军据点约五华里，因故彼此没有谋面。在高家庄，按照军政大学接待同志的安排，连续六天，完成了参观访问计划。临往回走的那天早晨，徐深吉校长约我和校部其他负责人一起吃早饭，表示送行。我讲了“百团大战”劳军的故事。徐说，那时精力集中在打仗上，就是见了面也不会记得住。我返回邢台以后，很快写出了参观书面报告，交了差。但此事再也不见有人提起，北方大学与军政大学办学方针有异，也于此可见。以前我上下太行都是跟着队伍走，这次单独行动。来回不过半个月，一路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后来读唐朝人吴融作于长治的《金桥感事》诗：“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我就像身子又回到了行走在从长治到高家庄的二月朔风中。

第二回再上太行再下平原，就是同北方大学同学一起从邢台迁至长治高庄，然后又从高庄迁回原校址了。在高庄的一年半，生活环境安定。学校的大部分教育计划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实施的，一切井然有序。我一多半时间住在高庄东头与村庄不相连结的一所宽敞的地主大院子里，养病种菜读书。晚饭后、星期天这里常常成了一些同志如王冶秋、叶丁易等相聚谈今说古的地方。太行山上的平静不过表示此间距离战地遥远。我们耳闻目睹，周围一派热气沸腾。所在地的轰轰烈烈的农村土地改革接近收尾，历来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现在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人。1947年秋天，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行政学院的干部、学生参军随刘邓大军南下。冬天，学校内部也展开查成分、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运动”。凡此种种，不能不触动每个人的思想，引起认识、情感的变化、转折。我们这些同上太行同下平原的人，各有无法忘怀的感受。在今天，大家共同的感受恐怕是：时代远远前进了，当初的革命精神显得越发珍贵。也许同志们会说一句：“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决定何时作出的，我不了解。1948年5月4日，北方大学校部和两个研究室由高庄返抵邢台。5、6月间，几次准备动身去正定与华北联合大学汇合，又几次停留下来。6月底，两个研究室由我带队作为第一批出发。第二天中午到路旁一个车马店休息打尖，碰上一位从北面骑自行车快速过来的工作人员模

样的青年。他反复打量我们，神情是想要发现什么。我也打量他，随即问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有何贵干？他说从正定来，到邢台去，是华北大学工作人员，奉成仿吾校长之命给范文澜校长送一封亲启信。我问他是否知道信的内容，回答不知道。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行动，会不会跟前几次一样，暂缓北去？于是我自我介绍以后看了那封信。内容很简略，说正定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了，北方大学同志可以马上启程。他们等着欢迎。我在信上写了一行字，说明信是我拆开的，按照原订日程前往。我们虽然只是北方大学的头一批人员，实际上是教职人员里面应该到达的大部分人员。抵达正定的当天，成仿吾同志设席招待，热情讲话，祝贺两校合并。这是7月1日，街道上贴着大字标语，机关团体在庆祝共产党的生日。

北方大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先分后合，各有特点。它们共同的地方是过渡性，从一种形式、规模过渡到新的形式和规模。它们，尤其是华北大学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大汇合的地方。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涌向华北革命根据地，大有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涌向延安那种势头。今天回顾这段生活，我们像忽然重新领悟到一个新的、划分历史阶段的时代潮流正在兴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扭转乾坤的伟大斗争在中国大地上展开。雷鸣电闪，人喊马嘶，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思想上不能不受到震撼。这些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中投奔共产党领导的区域中去的人，社会关系、生活环境肯定

有相近的，有相远的，在行动上却选择了同一个方向，表现出思想上的极大共同性。他们的行动是分散的，他们的行动又是群众性的。这使有兴趣探索历史的人，想知道他们的要求为何，愿望是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显然谈不到树立了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中国当时也不发生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的政治观点、希望，基本上是爱国与民主。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共产党主张中国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无疑是知道的，不过有的朦胧模糊，有的明确肯定。1948年冬天，吴晗、田汉到达解放区，吴晗在华北大学一次人数众多的学生集会上讲演，有学生提问：你现在主张拥护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以后共产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你怎么样？吴回答说：那时我已经老了，那不是我的事，是你们的事了。这个故事说明青年学生完全了解，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前途最终将通往社会主义。他们不是直接为投奔社会主义而来的，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却抱着对社会主义一定程度的同情、憧憬和愿望。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论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这样说有欠周全，是把历史唯物论认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表述得过于简单了。倘若历史的发展与人们的主观愿望毫无联系，那历史就将变得很神秘，似乎某种超越社会的力量凌驾于它之上，驱使支配一切，人们无可作为。再说，把人的愿望从历史中抽掉了，

实际也就意味着把创造历史的人抽掉了，那岂非真的成了无人的历史，怎么能够讲得通？历史发展是不能脱离人们的要求、愿望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愿望。唯物论没有把人的愿望排斥在客观规律性外面。唯物论只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基础出发，说明他们的要求、愿望，说明、认识社会演变的客观规律。不同的社会阶级、人群利益不同，要求、愿望互相矛盾。他们中有顺应时代前进潮流的，有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这就是历史运动发展的决定关头何以彼此对抗、矛盾的愿望，那一方落空、失败了，这一方又实现、胜利了。胜利正是反映了千百万人的要求、愿望，以至整个民族的愿望。历史发展又充满迂回曲折。小前进小曲折，大前进大曲折，前进不会被曲折抵消，前进却会被曲折打断。每当此时，历史潮流，人们的要求、愿望，就表现为向后倒退，脱离原来的大方向。唯物论不能只承认前进是时代潮流、人们的愿望，而不承认倒退同样是时代潮流、人们的愿望。唯物论并没有把倒退的时代潮流排除在历史规律性认识的外面，就像没有否定历史终究要不断前进一样。问题在于要分辨出哪个潮流是暂时的，一瞬间就过去的，哪个潮流是长远和持久，虽千回百转而终归要实现的。北方大学、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汇集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们当时没有可能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待自己的行动、愿望，在事实上又不能不是从一个部分、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历史正在作出自己的抉择：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为新民主主义直至接踵而来



的社会主义。他们的行动、愿望胜利了和实现了，他们的胜利正是反映了千百万人的要求和愿望，反映了100年来我们民族要求独立、走自己的路的一贯愿望。因此，这个胜利也就不是暂时的、转眼就过去的闪亮，而是长远和持久的照耀历史前程的火炬。没有别的力量能够动摇它，除了获得胜利的人们自己。证据在哪里，证据就在新中国已经越过了自己的40年，现在正在充满活力，浩荡前进。